

旧版文章

天人古今

- [古今通论](#)
- [古代通论](#)
- [世界史论](#)
- [当代三农](#)
- [现实问题](#)
- [旁通类鉴](#)

先秦史论

- [先秦通论](#)
- [原始经济](#)
- [文明起源](#)
- [夏商西周](#)
- [春秋战国](#)

汉唐史论

- [汉唐通论](#)
- [战国秦汉](#)
- [秦国秦代](#)
- [西汉东汉](#)
- [魏晋南北朝](#)
- [隋唐五代](#)

宋元史论

- [宋元通论](#)
- [唐宋通论](#)
- [北宋南宋](#)
- [辽金西夏](#)
- [蒙元史论](#)

明清史论

- [明清通论](#)
- [明代通论](#)
- [明中后期](#)
- [清代通论](#)
- [清代前期](#)

近代史论

- [近代通论](#)
- [清代晚期](#)
- [民国通论](#)
- [民国初年](#)
- [国民政府](#)
- [红色区域](#)

现代史论

- [近世通论](#)
- [现代通论](#)
- [前十七年](#)
- [文革时期](#)
- [改革开放](#)

学科春秋

- [学科发展](#)
- [专题述评](#)
- [年度述评](#)
- [学人学术](#)
- [学者小档](#)

理论方法

- [史观史法](#)

[国文学网——中国经济史论坛 / 汉唐史论 / 西汉东汉 / 思想、文化、人物 / 从司马迁到班固——论中国经济思想的转折 \(二\)](#)

从司马迁到班固——论中国经济思想的转折 (二)

2004-10-24 宋叙五 国史探微2004-05-18, 旧版文章 点击: 1277

从司马迁到班固——论中国经济思想的转折 (二)

从司马迁到班固——论中国经济思想的转折 (二)

作者: [宋叙五](#) (中国经济史论坛于2004-5-28 17:39:35发布) 阅读309次

作者提供, 宣读于中国经济思想史学会第十届年会 (山西太原, 2002)

三、班固的思想

在《史记》和《汉书》中, 有许多共同的题目, 司马迁与班固对这些共同的题目, 所表现的思想、见解, 完全不同。我们可以看出: 司马迁代表的是西汉时人的思想, 而班固代表的是东汉时人的思想。时间相隔约为一百五十年, 二者思想已经是南辕北辙。其原因何在? 我们应先探究一下班固思想的历史背景。

第一、班固思想的历史背景

首先说汉朝皇室的基本立场:

汉皇朝是秦皇朝的继续。所有的一切都是由秦皇朝继承而来的。不但是有形的法律制度, 就是连一切统治国家人民的基本观念和态度, 也是由秦朝而来。其中有一点就是重农。

重农, 本是商鞅相秦时, 为在列国战争中取得胜利的权宜之策, 并非治国的长久之计。当时在秦国实行, 已属饮鸩止渴; 汉朝统一之后, 列国争胜的情况已不存在, 更应抛弃重农政策, 使社会经济顺自然趋势, 健康全面发展。但因汉朝皇室对此情形未能了解, 一味抓住秦朝的治国理念不放。

汉高祖平天下, 令贾人不得衣丝乘车, 重租税而困辱之 (注3), 其用意就是重农抑商。但终高祖之世, 社会一直在战乱之中 (注4), 重农抑商的法令, 并没有认真执行。惠帝、高后时期, 行黄老之术, 采自由放任之态度, 与民休息 (注5), 并没有干预民间的经济活动。到文帝时期, 才又由皇帝提出重农的教导。 (注6) 但达不到效果。

又到了汉武帝时期, 武帝元年 (公元前140) 举贤良文学, 五年 (公元前136), 罢黜百家, 独尊儒术, 立五经博士。其后又置博士弟子员, 一再提高儒家的地位。

本来, 在文帝时期, 除历次由皇帝下诏书, 提倡以农为本外, 又由一些御用文人如贾谊, 晁错等, 撰写重农的文章 (注7)。但是, 这些文章尚无法掩盖当时整个学术界, 舆论界。而且在西汉社会经济蓬勃发展的情形下, 人民弃农就工商的潮流无法阻止。

到了武帝罢黜百家, 独尊儒术之后, 再到了西汉末年, 其效果已经显现: 儒家不但独占了学术界, 舆论界, 更独占了官场 (注8)。到了东汉初年, 儒家舆论, 更形成一言堂的局面。

以上就是班固思想的历史背景。

第二、班固评司马迁

《汉书·司马迁传》, 班固对司马迁的批评为:

……又其是非颇缪于圣人, 论大道则先黄老而后六经, 序游侠则退处士而进奸雄, 述货殖则崇势利而羞贱贫, 是其所蔽也。

历史理论
领域视野
方法手段
规范学风
史料索引
古今文献
考古文物
简帛文书
回忆追述
社会调查
论著索引
论著评介
通论文集
古代史著
明清史著
近代史著
现代史著
动态信息
期刊集刊
网站网刊
团体机构
学术会议
研究动向
他山之石
世坛综考
美国史坛
西欧史坛
东亚史坛
其他地区
池月山云
文史随笔
知识小品
诗词诗话
文艺点评
小说演义
史眼世心

班固在评论司马迁之前，已经先有了一个是非标准。这个是非标准是圣人的标准。根据这个标准，他批评司马迁：论大道则先黄老而后六经，序游侠则退处士而进奸雄，述货殖则崇势力而羞贫贱。而圣人的是非标准，应该是：先六经而后黄老，进处士而退奸雄，羞势力而崇贫贱。如果照班固的意思，每一个人，在品评别人的时候，不再能按照自己的意思，清心直说。而必须将圣人的是非标准，摆在前头。于是，我们可以看到，东汉时期的读书人，已经不再像西汉时期一样的自由开放，而已经自我封闭了。东汉之后，一直到清朝，甚至于到近代，中国读书人，都自我封闭在圣人的思想模式之中，以后人比后人，以东汉人比东汉人，看不出这种自我封闭的情形。小脚女人比小脚女人，彼此欣赏，看不到缠脚的害处。但缠脚的见到天足女人，才看到缠脚的可怜。将班固和司马迁摆在一起，才看出班固的封闭性，也看出司马迁的可贵。

本文以讨论二人的经济思想为主，所以专就二人在《货殖列传》中的异同来讨论。班固批评司马迁在《史记·货殖列传》中，崇拜有钱人，而羞辱贫贱人。但我们又可以看看司马迁在《史记·太史公自序》中的解释他为甚么要写《货殖列传》。司马迁说：

布衣匹夫之人，不善于政，不妨百姓，取与以时而息财富，智者有采焉。作《货殖列传》第六十九。

司马迁说：他在《货殖列传》中所列举的人，都是布衣匹夫，没有政治凭借，（注9）完全以个人的力量，创业致富。他们的行事，应该说出来，作为世人的榜样及借鉴。

在《汉书》中，也有《货殖传》。奇怪的是《汉书》应该写汉朝（西汉）的人和事；但在《汉书·货殖传》中，将《史记·货殖列传》中所列举的范蠡、子贡、白圭、猗顿、郭纵、乌氏、巴寡妇清等春秋战国时人完全收录，其后才是西汉时人，（也完全与《史记·货殖列传》中相同）。但在《汉书·叙传》中，班固说明自己写《货殖传》的动机，则与司马迁大大的不同。他说：

四民食力，罔有兼业。大不淫侈，细不匮乏。盖均无贫，遵王之法。靡法靡度，民肆其诈。偪上并下，荒殖其货。侯服玉食，败俗伤化。述货殖传第六十一。

班固上述这一段话，就说得非常严重了！本来，司马迁在《史记·货殖列传》中说：个人，凭着自己的智能，在自由竞争的环境中，创业致富，本身的行为没有甚么不对。尚未发财的人应该力争上游；已经发财的人，可以尽情享受，即使生活奢侈，达到王侯一般的水准，也没有甚么不对。反正钱是自己赚来的。

班固的态度就不同了。他扮成一副道学家的面孔，说出孔子「不患寡而患不均」的道理。对创业致富的人，扣上「偪上并下」的罪名，并且说这些发财的人，生活奢侈，侯服玉食（衣食和王侯一样），是败俗伤化的事。班固写《货殖传》，是对这些人加以谴责，劝世人不要学习他们。

第三、班固论西汉社会

《汉书·食货志》，班固说：

文帝即位，躬修节俭，思安百姓。时，民近战国，皆背本而趋末。

上述一段，是班固对西汉社会的描述，也是班固对西汉社会的评价。

文帝初即位（文帝元年是公元前179年），刚刚接续惠帝和高后「与民休息」之后，是西汉社会比较安定繁荣的一段时期，中国历史上称为「文景之治」的开始，应该是一个盛世。但班固却说：

时，民近战国，皆背本而趋末。

战国，根据儒家的说法，「礼崩乐坏」，是一个衰世。班固为甚么说西汉是一个衰世呢？因为西汉「民近战国，皆背本而趋末。」西汉农民纷纷弃农趋末，离开农业，投奔工商业。班固因而说西汉社会是一个衰世。

司马迁在《史记·货殖列传》中说：

汉兴，海内为一、开关梁，弛山泽之禁。是以富商大贾，周游天下，交易之物莫不通得其所欲。

司马迁说：汉朝统一天下，出现了两项重要因素：

第一、开关梁，因为天下统一，以前各国与各国之间的关口都打通了。商人在全国范围内通商往来，比前更方便了。

第二、山林，沼泽，各个地方的天然资源，以前是被各国诸侯霸占住，现在都开放了，商人可以自由开采。

总的来说，是全国整体经商环境，比前改善了。

商业环境改善，农民弃农事商，本来是平常事，也是好事。司马迁说：人之趋利，若水之就下，这是自然的事。政府如果阻止人民趋利避害，才是不对。但班固不然。他将西汉时期人民纷纷弃农趋末，认为不对。他认为理想的社会是：

士相与言仁谊于闲宴，工相与议技巧于官府，商相与语财利于市井，农相与谋稼穡于田埜。朝夕从事，不见异物而迁焉。……各安其居而乐其业，甘其食而美其服。……此三代所以直道而行，不严而治之大略也。

根据上引一段，我们可以看出：班固以一个东汉人，写西汉社会，而以三代（夏、商、周）社会为理想。他所理想的社会，有四个格子，士、工、商、农各自占据一个格子如下：

士|
相与言仁谊于闲宴
商|
相与语财利于市井
工|
相与议技巧于官府
农|
相与谋稼穡于田埜

在班固理想的社会中，士、工、商、农四个社会阶层，应该彼此隔离，朝夕从事自己的行业，不见异物。他希望每一个阶层，各安其居，而乐其业，甘其食而美其服。各自安于自己的环境、习惯，不作改变的思想。班固说：这一种模式，是三代的社会模式。也是他理想中的社会模式。

但是，作为一个史家，班固是一个失败的史家。作为一个东汉人，写西汉社会，却照着三代社会的理想写。而他所写出来的社会，当然远离西汉社会，也非三代社会，只是他心中所想象的社会。

第四、班固提出「四民」的说法

前面引述班固在说明自己写《货殖传》的动机的时候，一开头就说：「四民食力，罔有兼业」。我们又在《汉书·货殖传》中，看到班固对「四民」的说法是：

士相与言仁谊于闲宴，工相与议技巧于官府，商相与语财利于市井，农相与谋稼穡于田埜。朝夕从事，不见异物而迁焉。故其父兄之教不肃而成，子弟之学不劳而能。各安其居而乐其业，甘其食而美其服。虽见奇丽纷华，非其所习。……于是在民上者，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故民有耻而且敬，贵谊而贱利。此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不严而治之大略也。

司马迁在《史记·货殖列传》中，没有说四民，只举出四种生产行业。该四种生产行业是：农、虞、工、商。没有「士」。更没有「士、农、工、商」的说法。司马迁说：

故待农而食之，虞而出之，工而成之，商而通之。

又说：

农不出则乏其食，工不出则乏其事，商不出则三宝绝，虞不出则财匱少，财匱少则山泽不辟矣，此四者，民所衣食之原也。

班固将司马迁的「农、虞、工、商」四业，改为「士、农、工、商」四业。少了一种行业，就是「虞」；多了一种行业，就是「士」。又再看看班固对「士」的说法是：

士相与言仁谊于闲宴。

可见「士」已经不是一种生产行业，而是一种不事生产的行业。是在班固的观念中，社会上的生产行业，已经由四种缩减为三种。减少了「虞」。从上古到西汉，「虞」都是一个主要的生产行业。它是除农业之外，人类开发利用大自然并造福人类的一种行业，诸为后代的渔、林、矿、牧等行业，在古代都属于「虞」的范围。司马迁说：「虞不出则财匱

少，财匮少则川泽不辟矣。」可以看到「虞」这一行业的重要性。

第五、司马迁与班固对西汉富人之褒、贬

对商人、富人之评价，司马迁与班固完全相反。司马迁对西汉时人，以平民身份自行创业，发财致富者，采取欣赏、表扬的态度；并且说应该把他们的事迹说给一般人知道，可以借鉴。而班固刚刚相反。

《史记·货殖列传》有一段列举西汉时期平民创业致富的人，以及他们创业的简单经历。在这一段的后面，司马迁说：

此其章章尤异者也。皆非有爵邑、奉禄，弄法犯奸而富。……至若力农畜工虞商贾，为权利以成富，大者倾郡，中者倾县，下者倾乡里者，不可胜数。

司马迁的意思，非常明显：第一，他所列举的富豪人物，都是平民，第二，他们致富的过程中，没有借助于政治势力及政治地位，没有不法的行为。所谓：「皆非有爵邑、奉禄，弄法犯奸而富。」已经说得非常明白。

但班固就完全不同。

班固在《汉书·货殖传》中，几乎完全抄录了《史记·货殖列传》中所列举的西汉富人及他们的创业经过。但在这一段后面，班固说：

此其章章尤著者也。其余郡国富民兼业颀利，以货赂自行，取重于乡里者，不可胜数。……皆陷不轨奢僭之恶，又况掘冢搏掩，犯奸成富，……伤化败俗，大乱之道也。

班固所列举的西汉富人，及其创业的事迹，与司马迁相同，在个别列举的时候，也没有列举出每一个人的犯奸成富的事实，但所作的评语完全相反！司马迁所强调的，是这些人「皆非有爵邑、奉禄，弄法犯奸而富。」班固所强调的是：「皆陷不轨奢僭之恶，犯奸成富」并且说：「伤化败俗，大乱之道也。」

另外可以留意的一段，是司马迁在列举一些大富人之后，有一段话是：

此其章章尤异者也。至若力农畜、工虞商贾，为权利以成富，大者倾郡，中者倾县，下者倾乡里者，不可胜数。

以上一段，司马迁是说，西汉社会，不是只出大富豪，而且可以培养一些中富豪，小富豪；大富豪富可敌国，中富豪可以倾郡、倾县，小富豪可以倾乡里。司马迁告诉世人，西汉不是一个两极化的社会，而是有中产阶级的社会。平民、个人都可以创业。商业固然是较容易发财致富的一个行业，其它行业亦一样可以致富，只要个人有智能有毅力，农、畜、工、虞、商贾都可以致富。

但同样一段话，同样一件事，在班固说来，则语意完全不同了。班固说：

此其章章尤著者也。其余郡国富民，兼业颀利，以货赂自行，取重于乡里者，不可胜数。

照这段引文，班固是说，除上面所说那些大商人之外，其余郡国富民也不是好东西，他们也是靠「兼业颀利，以货赂自行」而发财的。真可谓一杆子打死一船人，一棍子打死所有的商人，甚至不止于商人，凡是想发财致富的，都不是好人。思想的转变，何止一百八十度。

司马迁在《史记·太史公自序》中，标明他写《货殖列传》的动机是：

布衣匹夫之人，不害于政，不妨百姓，取与以时而息财富，智者有采焉。作货殖列传第六十九。

司马迁说明自己写《货殖列传》的动机是，他在传中所列举的人，都是布衣匹夫，都是平民，而他们在创业致富的过程中，没有借助于政治势力，没有妨害百姓。所以他们的事迹，应该表扬，世人也可以借鉴，可以模仿。但班固在《汉书·叙传》中，说明他写《汉书·货殖传》的动机是：

四民食力，罔有兼业。大不淫侈，细不匮乏。盖均无贫，遵王之法。靡法靡度，民肆其诈。偪上并下，荒殖其货。侯服玉食，败俗伤化。述《货殖传》第六十一。

班固说：一个人，要想发财致富，这种心理就是不对的。因为圣人已经有「均无贫」的教训。如果一个人发了大财，作了大富豪，更是不好。因为他已经犯了「偪上并下」的过错。偪上，因为他富可敌国，财富多到可以危害国家政权的稳定；并下，是指兼并穷人，

害得穷人没有土地，没有工作，没有饭吃！再说，富人生活奢侈，以一个平民，衣服和饮食达到王侯的享受水准，败坏社会风气！

因此，班固写《汉书·货殖传》，是要贬抑商人，贬抑富人，贬抑个人发财致富的心理与行为。

第六、《汉书》中写经济专注农业摒弃工商

在《史记》中，经济范畴，有农、虞、工、商。在《史记》中，讲经济的有两篇，一篇是《货殖列传》，讲述民间社会经济动态；一篇是《平准书》，讲述国家的经济政策。在《货殖列传》中，我们看到西汉前期（到武帝末为止）社会百业兴盛的现象。而人民所从事的生产行业，大别为农、虞、工、商。

《汉书》讲经济的篇章，为《食货志》，内容为农业与货币。《汉书·食货志》开头说：

洪范八政，一曰食，二曰货。食谓农殖嘉谷可食之物。货谓布帛可衣，及金刀龟贝，所以分财布利，通有无者也。

我们如果将货币不看成是一种生产行业，则《汉书》中讲生产行业的只剩下农业一种了，已经不再提到工商业。即使农业，也已经简化到粮食种植这一个狭窄的范围了。

在《史记·货殖列传》中，提到的农业是相当广义的。《史记·货殖列传》说：

故曰：陆地牧马二百蹄，牛蹄角千，千足羊，泽中千足彘；水居千石鱼陂；山居千章之材，安邑千树枣，燕、秦千树栗，蜀、汉、江陵千树橘，淮北、常山以南、河济之间千树萩，陈、夏千亩漆，齐、鲁千亩桑麻，渭川千亩竹；及名国万家之城，带郭千亩亩钟之田，若千亩?茜（染料），千畦姜韭，此其人皆与万户侯等。

以上所列举的十多个项目，广义来说，都属于农业，如果试作细分，可以分为以下种类：

- 一、牧畜业，
- 二、鱼类养殖业，
- 三、林业，
- 四、果树业（枣、栗、橘），
- 五、工业原料业（萩、漆、麻、竹、?茜），
- 六、粮食。

可见西汉时期之农业及土地利用，是非常广义的。但在《汉书·食货志》中，就把农业缩窄到非常狭窄的范围，只是说：「食谓农殖嘉谷可食之物。」农业缩小到只限于粮食种植的范围。经济观念的改变，直接影响到后世中国人的经济行为。东汉之后，一直到明、清，到近代，中国国民生产，只剩下农业，抑制工商。而农业又缩窄其范围只限于粮食种植，国民经济的偏枯，达到极点！

《汉书》之后的史书，大体都是依照《汉书》的体例，在《食货志》中，提一提农业、户口，赋税等，工商业完全没有地位。例如《清史稿·食货志》，其项目为：

食货一、户口、田制，食货二、赋役、仓库，食货三、漕运，食货四、盐法，食货五、钱法、茶法、矿政，食货六、征榷、会计。

也完全不提工、商。

工商业在中国国民经济中，完全没有地位了！

四、思想转折的后遗症

第一、农本思想之积淀

本段标题是「农本思想之积淀」，是想说明一个事实，是「农本思想」在中国社会里，愈积愈深，愈积愈厚，愈积愈坚实而不可去。

其它的思想，停留一个时期之后，就会消散，但农本思想正正相反。它不但不消散，而且久而弥坚。

1999年，在香港树仁学院一个国际学术研讨会上，本人提出一篇论文，题目是《农本思想与中国现代化》，主题是：农本思想妨害了中国的现代化。为了中国的现代化，中国人必须勃然反省，彻底抛弃农本思想！

1999年研讨会后，笔者收到许多来信，赞成与反对笔者意见的，各约半数。（本人对各来信指教的学者，不论正、反，均怀深切感谢之心。）由此可见，冰冻三尺，消融尚需时日也！

在上述那一篇论文中，笔者说明：农本思想不是一种经济思想，而是一种政治性加社会性再加伦理道德性的思想。说它是政治性，是因为历代帝王及官员，认为人民株守在农业中，聚居在农村中，容易治理；说他是社会性，是皇帝及政府官员，再加地方仕绅，都认为人民聚居在农村中，有助于养成淳朴的风俗，俭朴的生活，伤风败化的事较少。说它是伦理道德性的，是农业家庭中的家长、族长认为家庭成员集中在农村中，可多生子女，子女又可以早婚，又再早生多生子女。老人家希望见到四代同堂；希望得到「五世其昌」的牌扁。不愿子弟离开农业，因为「商人重利轻别离」，对伦理道德都有冲激、破坏作用。

以上不论是帝王、官吏、家长、族长、仕绅等人，都根据自己的立场，巩固农本思想，并不顾虑他们的行为，对中国国民经济的伤害。而且，中国读书人，自东汉至近代，只「读圣贤书」，不理经济民生等事，更不知道农本思想对中国国民经济的祸害。农本思想排抑工商，在政策上当然尽量贬抑工商，工商业技术在二千年来，陷于停顿状态，这是农本主义者认为理所当然的事。与此同时，在这二千年来，农业技术也陷于停顿。因为农本主义者的目标，是要全国劳动力都集中到农业中，都聚居在农村中，过着简朴的生活，保持淳朴的风俗习惯，因此，他们认为：

- 一、农耕技术，低下好过先进，农耕技术的改进，会破坏农村的均衡。
- 二、农民贫穷好过富裕，贫穷会使农民生活简朴，风气淳厚。

因此，中国农业技术自然保持在西汉武帝时期的水平，西汉之后的历代帝王，虽然勤于颁布劝民以农为本的诏书，但少有改良农耕技术者，历代帝王都劝民开垦荒地，但极少劝民改良农耕技术。文人学者，人人都在文章中表示以天下苍生为念，但少见有人提出改良农耕技术。

第二、社会阶层的分化，及「士」对读书的垄断

在上段，我们将班固的「四民」理解为四种生产行业。其实，在班固的观念中，「四民」应该是四个社会阶层才对。两者的分别是：一、社会阶层有高低；生产行业则无高低之分。二、生产行业各业之间的流动性大，社会阶层之间的流动性小。

士以读书为专业，所以必须读书才可以成为士。其它行业可以读书，但不必须读书，到了后代索性就不读书了。后世有「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说法，「士」的社会地位更高了。在四民的社会地位中，明显地以士、农、工、商的高低划分。而历代政府，亦用许多政策，限制农民转入工商业，又阻止工商子弟考取功名及入仕。

在西汉之前一直到西汉武帝时期，各行各业的人都读书，读书不是一种专业。而各种行业，也没有高低之分。如吕不韦是一个商人，也是一个大学问家，其后又做了秦国的相国。范蠡是一个成功的商人，亦是一个大学问家，又可以做到越国的高官。到了西汉，桑弘羊是一个商人，也是一个大学问家，在汉武帝后期又做了大官（注10）。与桑弘羊同时期，汉武帝实行盐铁专卖政策的时候，郑当时任大农（财政部长），他推荐两人做助理财政部长（大农丞），分管盐、铁。管盐的叫东郭咸阳，是山东沿海地区一个煮盐发达的工业家；管铁的叫孔仅，是南阳地方一个最成功的冶铁工业家（注11），可见在汉朝武帝之前，工业家及商人，都读书，都可以做大官。可见在汉朝武帝时期及以前，「士」可以出身于每一个行业，作官的也可以出身于每一个行业。而当时社会上尚没有一个可以垄断读书而不事生产的阶级「士」。

西汉前期一直到武帝时期，政府官员出身于各种生产行业，如工业、商业。可知各种生产行业都吸纳了或者培育了一批社会精英。这些社会精英，多数读书，再如果事业有成，以及有一些知名度，就有机会得到推荐到朝廷作官。但是，这种情形，在武帝时期已经受到压制，而在武帝之后，也就不存在了。

我们可以想象，如果工、商业精英可以入朝作官的情形一直维持下来，则工商业者为了创业成功，及增加知名度，必会用功读书及努力研究本身行业技艺的改进方法，又或者将自己的心得、理论着之于书，传之于世。就像春秋战国时代的军事家孙武，有孙子兵法，商业家白圭有商业理论，都可以传下来，后一代人又可以将前一代的理论精研改进，

中国的工业技艺及商业经济理论，在西汉就可以发展到非常高的水准，为西汉社会走上资本主义道路准备条件及动力。

但是，历史事实非常残酷。汉朝武帝之后，再到东汉之后，社会已经分化。读书人不事生产，而生产行业中的人不读书，社会在这种分化之下，中国读书人的知识领域中，就完全没有与经济、生产、农工商业有关的内容了。中国的经济、农工商业也就一直停顿在汉朝的水准，有退无进了。在今天，中国社会中，商人供奉的祖师是陶朱公，农民所供奉的祖师是神农，工匠所供奉的祖师是鲁班，全部是春秋战国或更早时期的人。可见在春秋战国时期之后；中国读书人对农工商业的技术、理论全不理睬，任令所有生产技术长期停顿。「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百余年」之说，或者可以在文、史、哲学家中有之，若求于农工商业或经济、民生方面，二千年来，是一个断层。

第三、道统的观念

从汉武帝立学官后，儒家不但完全占据了学术的殿堂，而且也成了为皇家为政府保驾护航的队伍。既然要为皇家保驾护航，所以在学术界也形成一个中心，要形成一个学术领导中心，后世即称之为「道统」。要所有学术界人拱卫着这一个道统，这个道统又拱卫在皇家权威之旁。

《汉书·儒林传》班固说：

儒家者流，盖出于司徒之官，助人君顺阴阳明教化者也。……祖述尧舜，宪章文武，宗师仲尼，以重其言，于道为最高。……唐虞之隆，殷周之盛，仲尼之业，已试之效者也。然惑者既失精微，违离道本。……

可见班固已认为儒家已经有一个「道」，而这个道，又是助人君顺阴阳明教化之道。也就是读书人（儒家独占）应该有一个道统，在这个道统之下，读书人的读书做学问的空间，以及出仕之后的立身行事，都受到很大的限制。

唐朝文人韩愈，在《原道》一文中说：

夫所谓先王之教者，何也？……尧以是传之舜，舜以是传之禹，禹以是传之汤，汤以是传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传之孔子，孔子传之孟轲，轲之死，不得其传焉。

这就表示，在班固之后，所有中国文人，都有这种道统思想。韩愈虽说，孟轲死后此道不传，但其意思，他自己才是此道统的传人。这种思想，使历代中国文人都以这个道统中人自居。不但局限自己，也用以局限别人，使历代文人愈趋保守。特点之一，即是学问愈空洞，愈远离经济民生，不食人间烟火。只懂背诵仁义道德之空言，对社会经济、民生事业完全漠然无知。

本来，司马迁也对中国文化的统绪，有一番继承的壮志。《史记·太史公自序》说：

太史公曰：先人有言：自周公卒五百岁而有孔子，孔子卒后至于今五百岁。有能绍明世，正易传，继春秋，本诗书礼乐之际？意在斯乎！小子何敢让焉。

司马迁这一番话完全以文化着眼，他要继承孔子的事业，整理及解释中国的文化典籍，承先启后，因为「天下遗文古事，靡不毕集于太史公」（注12）。他有机会收集并浏览最多的中国古代典籍，所以当仁不让地有继承孔子整理中国典籍传之后世的责任。既没有「道统」的观念，又没有为政权保驾护航的责任。他是以一种开放的态度，致力于将中国文化学术发扬光大。与后代文人「道统」观念完全不同。

现在我们将两个统绪绘图如下，以资比较。

儒家的道统：

尧—舜—禹—汤—文—武

周公—孔子—孟子……韩愈……

司马迁所说的文化统绪：

周公—孔子—司马迁……

两个图比较，就看得非常清楚。韩愈所说的道统，是将文化传统与政治权力挂钩，皇权属

于皇帝，但帮皇帝治理老百姓的，是读书人。读书人，属于道统中人，在读书做学问及立身行事方面，要受道统的规限，但也因此得到一些权利，就是可以做官，可以不事生产而有俸禄可得，又可以藉官位职权为祸或造福苍生。

中国读书人，称孔子为圣人，是在学术层面来讲，即是在学问上，孔子为最高。现在既然将学术文化与政治权力挂钩，于是也必须将政治统治者一并称为圣人，称尧舜禹汤文武为圣人，再因此必须称历史上所有统治者为圣人（注13），称皇帝为圣上。统治者既已为圣人，则政统与道统合而为一，士人在皇帝面前的地位遂无法再维持。

从中国的历史演变看来，时代愈往后，文化学术传统（道统）与政治权力（政统或皇权）拥抱愈紧。而文人在皇帝面前的地位，也愈来愈低。费孝通先生《论师儒》一篇文章中，（注14），有〈道统与政统〉一节，大意是：中国儒家最初是想以知识驾驭皇权。这是一种最理想的方法。皇帝马上得天下，不是理性行为的结果，如果能够以知识（理性）驾驭皇权，则是再好不过。但历史事实则是，时代愈后，儒家愈放弃自己的理想而迎合皇权。

在西汉，皇帝与大臣，可以面对面坐着议事，到宋朝，司马光、王安石等人还可以「坐而论道」。到了明朝、清朝，在皇帝面前，大臣只能跪着。而关于治理国家的事，文人也只能仰承圣意了。

余英时先生在《史学与传统》一书中，说中国皇帝对待「士」有四种不同的态度，分别是师、友、臣、奴。最好的礼遇是以「士」为师。最下者以「士」为奴。在战国时期，各国诸侯常因士人的品位高低而给予不同的礼遇，如魏文侯事子夏、田子方、段干木等人为师；视吴起、李克、乐羊、西门豹为臣（注15），但时代愈后，士人地位愈低。到了清朝，虽明君如康熙、雍正、乾隆等，亦视臣下为奴了！

司马迁想继承的文化统绪，是以学术文化为内涵，并不与政治权力挂钩。周公是中国文化的开创者，包括典章制度的建立，孔子是对中国传统文化整理、解释并承先启后的人，司马迁也因为「天下遗文故事靡不毕集于太史公」，而当仁不让地作了解释并传扬传统文化的人。文化学术传统是独立于政治权力之外的。

第四、文起八代之衰？

在中国文学史上，有「文起八代之衰」的说法。又有一句话，是「唐诗、晋字、汉文章」。汉朝的文章最好。又有一句话，是：「文章西汉两司马」。西汉的文章最好的是司马相如和司马迁。

一般人对「文起八代之衰」的理解，是唐代文人韩愈等，复兴古文运动。这件事的意义是正面的，值得肯定的。中国的文章，在西汉后期衰微之后，历经八个朝代（东汉、魏、晋、宋、齐、梁、陈、隋）的沉寂状态，到唐朝韩愈等人，才再复兴起来。是一件值得庆幸的事。但是，如果对这一件事情的历史演变加以深层思考，就会发觉这并不是一件值得庆幸的事，而是一件值得悲痛的事。

西汉是中国最好的朝代，本来是最有希望的朝代。西汉，封建体制刚刚崩溃，汉朝一统天下，社会经济欣欣向荣，生产事业蓬勃，全国经商环境大好。农民纷纷弃农投奔工商。其情形刚好等于欧洲十六世纪之后，封建体制崩解，社会进入重商主义时期一样。

西汉最好的文章，是描写并解释当时社会经济情况的文章，除上述司马迁的《史记·货殖列传》（《史记》中每一篇章，都是好文章）外，最好的文章要推贾谊的《谏铸钱疏》

（注16）以及晁错的《论贵粟疏》（注17）等。除了文章好之外，内容也是对社会经济国计民生的讨论。这种文章，根据欧洲的历史发展，是后来经济科学材料。如果西汉的政治环境不变，中国在西汉中、后期，就可能发展出当时的经济学，为中国社会进入资本主义社会预备条件。但是，中国非常不幸，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大棒子打下来，把中国的文章打死了！

西汉武帝之后，没有文章。

东汉之后，中国读书人的学问内容（限于儒家的《五经》，到了宋朝朱熹之后，有了《四书》。），愈形空洞。有关民生、经济、工商技艺之事，不入学问。文人一下子不习惯写没有内容的文章，因此，也就没有文章了。

没有内容的文章，特别需要文字技巧。

因此之故，才有东汉末年的《典论论文》，以及六朝时期的《文心雕龙》等讨论文字技巧的作品出现。但始终是文字技巧，无法再有西汉时期的文章。

到了唐朝，韩愈等人一方面在所谓「先王之道」中找到信心，一方面为了应付科举的需要，提出所谓「文以载道」的口号。文章再次摆脱纯文字技巧的堆砌。此之所谓唐宋古文运动。但仔细辨认，西汉文章内容经济民生，唐宋文章之内容专注于道德仁义，雪月风花。有貌无实。若说韩愈「文起八代之衰」诚为中国文人只看表象不切实际之言，西汉文章一去不可复返矣！

第五、明、清之后的官、吏分家

由于读书人不亲俗务，不理民生、经济，柴米油盐之事，不食人间烟火，此种情况，时代愈后，愈形明显。而所产生的后果，就是地方官员对于其所治理的地方政府所应办理的粮、税收、河工、漕运、盐政、刑讼等大小事务、杂务一概不知，必须委诸幕僚办理。明清两朝，形成官、吏分家的制度。即官员不理事务，大小事务均委由幕僚主理。到了清朝，各府县衙门的各项事务，也变成专业，譬如管刑讼的，管钱粮的，管盐政的，管河工的，皆分工成为专业，分由不同的幕僚主理。如此情形，所产生的后果如下：

一、官员对其属下的大小事务全不知情，一切要受幕僚操纵。官员只是读书为乐，同僚之间诗酒唱和，谈论道德仁义、治国平天下之空言。

二、各项实际事务，操纵在幕僚之手。流于极度的黑箱作业，使这些本来是与国计民生有关的事，完全失掉理性思考，更没有在学术层面上讨论研究谋求改良的机会。遂使弊端愈积愈厚。使民政成为贪污及扰民的祸源。大部份官员，在考取功名及入仕之初，都有做清官做好官的志向，但到任之后，一切受幕僚操纵，不流于贪官者百中无一。

后语

在本文的讨论中，我们看到西汉前期中国读书人的文章与思想，主要讨论司马迁，但也稍为提到贾谊和晁错，这些人不但文章好，而且讨论社会经济民生之大事，并且充份表露了作者们的经济思想。如果学术环境不变，在西汉中、后期，中国就会产生自己的经济学、货币学、财政学（当然是中国特色的），或者会令中国走上资本主义社会（当然是中国特色的）。

但，非常不幸！由于学术、环境的转变，中国的经济思想作了一百八十度的转变。从司马迁到班固，作为两个样本来观察，很明显地看到：中国经济思想，由乐观、自由开放的性格，转折入封闭、保守的方向；由肯定人类求利致富的本性，转折入压抑人类本性的方向；由重视百业转折入农本主义的方向；由文人学者热心讨论经济民生，转折入避谈经济民生、耻谈百工技艺的方向。（韩愈所谓：「巫医乐师，百工之人，君子不齿」：韩愈《师说》=这一个转折，使中国经济思想进入「冬眠期」逾二千年。

现在，新的千禧年又来。中国在改革开放二十多年后，又迎向全球一体化的新形势，作为学界，作为经济思想界，面对着上述两个样本，我们应该选择那一个呢？

宋叙五：香港树仁学院经济系教授

注释：

1. 亚当斯密（Adam Smith, 1723-1790）是英国经济学家，英国人称他是经济学鼻祖。他的代表作（The Wealth of Nations），出版于1776年。该书的中文译本有两种，最早的有严复译的书名叫《原富》，其后又有郭大力、王亚南合译的，书名叫做《国富论》。

2. 香港《开放》月刊1999年5月号有唐德刚教授一篇文章，题目是《论国家强于社会》。在那一篇文章中，唐教授说：「那在西汉初年便已萌芽了的中国资本主义，乃被一个轻商的国家一竿打翻，一翻两千年，再也萌不出芽来。」又：我的老师钱穆先生《中国文化史导论》，第六章（页128）也说：「中国社会从秦、汉以下，古代封建贵族是崩溃了，若照社会自然趋势，任其演变，很可能成为一种商业资本富人中心的社会。这在西汉初年已有颇显著的迹象可寻。」

3. 《史记·平准书》说：「天下已平，高祖乃令贾人不得衣丝乘车，重租税以困辱之。」
4. 公元前206年，在中国历史上称为汉高祖元年，是为汉朝的开始，但项羽的力量，仍然威胁着刘邦，刘邦还没有称皇帝。公元前202年，历史上说是高祖五年，刘邦才正式称帝，但仍然有一些反抗力量没有被消灭。高祖十二年（公元前195），汉高祖消灭掉最后一股反抗势力（英布），但也在这次战役中，高祖为流矢所伤，是年高祖即死，卒年六十二岁。可见汉高祖一生都处于战乱之中，并没有作过太平皇帝。
5. 《史记·吕太后本纪》赞：「太史公曰：孝惠皇帝、高后之时，黎民得离战国之苦，君臣俱欲休息乎无为。故惠帝垂拱，高后女主称制，政不出房户，天下晏然，刑罚罕用，罪人是希。民务稼穡，衣食滋殖。」
6. 《史记·孝文本纪》：元年（公元前179）正月，上曰：「农天下之本。其开藉田，朕亲率耕，以给宗庙粢盛。」又十三年（公元前167）上曰：「农天下之本务莫大焉。……其除田之租税。」
7. 贾谊及晁错等人有关重农的文章，见《汉书·食货志》上。
8. 《汉书·儒林传》，赞曰：自武帝立五经博士，开弟子员，设科射策，劝以官禄。迄于元始（元始为平帝年号，即西汉最后期。），百有余年，传业者寔盛，支叶蕃滋，一经说至百余言，大师众至千余人，盖禄利之路然也。
9. 在《史记·货殖列传》中的人物，都是平民，都是以个人创业成家的。在西汉靠政治势力起家的，一个是吴王濞，一个是邓通，在《货殖列传》中都没有名字。
10. 《史记·平准书》说：「桑弘羊，洛阳商人子。以心计，年十三，侍中。」又说：「元封元年（公元前110），桑弘羊为治粟都尉，领大农。」说桑弘羊是一个大学问家，是因为他在盐铁会议上（昭帝始元二年，公元前85年），以御史大夫的身份主持会议并发言，内容充实，辩才无碍。
11. 《史记·平准书》说：「于是以东郭咸阳、孔仅，为大农丞，领盐铁事。咸阳，齐之大煮盐。孔仅，南阳大冶。皆致生累千金。」我们前面在《货殖列传》中，看到有宛孔氏，以冶铁起家，宛就是南阳，孔仅可能是宛孔氏家族后代中的一员。可见西汉直到武帝后期，工、商业者都读书，都可作官。
12. 《史记·太史公自序》。
13. 清朝乾、嘉时期，有一位学者洪亮吉（公元1746-1809）在一篇文章中，说到中国历史演进的规律。谓：「一治一乱，运天地之生，前圣后圣，拯斯民之死」可以代表中国文人将历朝马上得天下的皇帝尊为圣人的思想。（见《洪北江诗文集》上册223至224页，〈重修唐太宗庙碑记〉一文。）
14. 此文收入吴晗·费孝通等着《皇权与绅权》（页23-38）中。
15. 见余英时先生着《史学与传统》（页30-70）所收〈道统与政统之间〉一文（台湾时报出版公司，1981年版）。
16. 贾谊这篇文章，见《汉书·食货志》卷下。在这篇文章中，贾谊提出一系列的货币理论，理论丰富而有条理。贾谊这篇文章在文帝六年（公元前174）提出，当时并没有得到文帝及政府采用，但到武帝元鼎年间（公元前113）武帝收铸币权于中央政府的时候，贾谊的意见大部份被采用。（可参阅宋叙五《西汉货币史》，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再版本，2002。）
17. 晁错这篇文章，见《汉书·食货志》卷上。这篇文章中，晁错说出「今法律贱商人，商人已富贵矣，尊农夫，农夫已贫贱矣！」的警句，并且提出「入粟受爵」的建议。这一建议在文帝十二年（公元前168）提出，实时被文帝采用为政策，办法是：人民可以将粮食送给政府（中央或边郡），政府根据人民入粟的数量给予不同的爵位（有罪者赎罪）。这一政策由文帝十三年（前167）实行，到景帝二年（前155）止。（详细讨论可参阅宋叙五着〈汉文帝时期「入粟受爵」政策之探讨〉一文。载《新亚书院学术年刊》第12期，香港中文大学新亚书院，1970）

编辑：陈爽

出处：国史探微2004-05-18

责任编辑：echo

[发表评论](#)

[查看评论](#)

[加入收藏](#)

[Email给朋友](#)

[打印本文](#)

平均得分 0, 共 0 人评分

如果你想对该文章评分, 请先[登陆](#), 如果你仍未注册, 请点击[注册链接](#)注册成为本站会员.

1 2 3 4 5 6 7 8 9 10